

第一章

绪论

中国历代的藏书，无论是官府藏书、私家藏书，还是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在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上都起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藏书活动是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藏书，人们将人类有史以来的思想智慧保存起来，并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来，直至当今，延续未来。藏书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一股重要力量，通过利用藏书、开发藏书，人们将知识化作财富，将智慧化作效益。藏书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发展的过程，这是因为，作为藏书的主体——书籍的萌芽、雏形、成熟、发展，总是在不断变化、不断丰富、不断创新。从古老的简牍到当今的电子读物，这种漫漫的变化过程和惊人的结果，让人们对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丰富的想象。然而，时下人们关心的似乎不是书的变化过程和结果，人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书的本身，即书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书？人们担心，不弄清书的确切定义，就无法对藏书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样又怎么能写出一部令世人满意的藏书史呢？实际上，我们在酝酿这本《中国历代藏书史》的时候也有过这方面的担心和困惑。现在，这本书的书稿已经完成了，有没有必要回过头来再议论一下‘书’和‘藏书’的定义问题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关于‘书’的争议

关于‘书’的定义,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甚至可以说,“书”是图书馆学理论界争议已久的一个热点和焦点问题。我们发现,关于‘书’的定义,就当前而论,少说有十几种,多说有几十种。有从书的物质形态论述的,有从书的内涵论述的,还有从书的功能去论述的。然而,在一篇有关“图书定义的讨论”的文章的结尾处,作者竟然给读者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结论:“通过上述讨论,对图书一词的定义有了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①截至目前为止,有关图书一词的概念是模糊的,定义是不确切的②图书是人们在能够携带的材料(载体)上兼用图象及大量文字传递思想感情的产物;③有关图书一词的定义讨论是有必要的④作者给图书下的定义也不一定是确切、严密、理想的,希望有关学者进一步讨论。①在此,我们不可能就“书”的定义展开大量讨论,但我们很赞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先生关于‘书’的定义的观点。李先生认为‘书’有三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是作为文字的‘书’(包括铭刻和书籍)。铭刻指用刀凿或硬笔(竹笔或木笔)在石、陶、金(铜器)、甲(甲骨)等材料上直接刻写,或在泥范上刻写反文(如铜器的范)或正文(如铜玺的范),然后再翻铸的文字,字体多为方笔,或按毛笔书写的字迹刻写(类似书丹后刻的碑铭)。书籍是指用毛笔蘸黑或朱砂在竹、木、帛、纸等材料上书写的文字,字体多为圆笔或比较草率的文字,即使是早期字体也一样可以有行、草之势。其二是作为档案的‘书’(文书)。李先生说“严格讲起来‘书于竹帛’的‘书’本来都是指作为档案或文件的‘书’,现在一般叫‘文书’。文书又分‘官文书’和‘私文书’。‘官文书’包括仪典类、占卜类、法令类、文告类、案例类、簿籍类、契约类、书信类等多种;‘私文书’包

①李永、李锡峰:《图书定义的讨论》,《晋图学刊》1998年第2期。

括占卜类、簿籍类、契约类、书信类、遣册类等多种。其三是作为典籍的书(古书),即历代史志著录的“书”,古人叫“艺文”或“经籍”。这样的“书”,现在一般叫“古书”或“古文献”。

书是藏书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对书的定义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后,对于藏书和藏书史的研究的帮助会是非常大的。

《中国历代藏书史》按中国不同的历史朝代,依据中国藏书的主要形式“官藏”和“私藏”,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历代藏书的方式、格局、特征、规模、沿革等展开叙述,从中窥见中国历代藏书的一般规律、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

二、中国藏书的一般规律

1. 意识形态政策环境对藏书的影响

图书是人类的思想文化产品,藏书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因而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综观历代帝王或统治者,他们对藏书的喜好或厌恶,他们推出的政策对藏书的促进或压抑,都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当时藏书业命运的兴衰。咸宁五年(279),战国魏襄王墓在汲郡出土,武帝闻讯后,即命人将全部葬物运至京师,得竹简小篆古书数十车,十万余言,皆藏于秘阁。太康元年(280)晋灭吴,“搜其图籍,封其府库”。宋代第二位皇帝宋太宗甚至亲自出马,规划筹建国家图书馆,所以在宋代中央政府的机构里,规模最大、建筑最壮丽的是国家图书馆。每一年围绕着藏书,宫廷内要举办各种有关图书的活动,如讲书、观书、观画、赐书等。特别有意思的是,每年仲夏举行的“曝书会”,几乎成为慰劳国家图书馆各级管理人员的例会。乾德四年(966),宋太祖就开始诏求亡书了。他规定:凡是吏民有献书者,史馆首先要查视书籍,如果是国家藏书所无,则收之。献书人也就送往学士院进行考试,合格者即委以官职。淳化五年(994)四月,当太宗得知已故的知制诰赵邻几家藏许多自唐及近代将相名贤事迹及家状、行状等资料的时候,急忙命令直馆钱熙

前往宋州赵邻几家,以钱十万把所藏的资料、遗稿共百余部全部收购回来。宋真宗在位 20 余年时间里,至少发布了四次求书诏令。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在东征西讨、戎马倥偬之时,便“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阅览”。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攻破元朝大都(今北京)之后,又命徐达“收图籍致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监丞,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即在南京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以贮古今载籍。同年,又建大本堂于宫中,取古今图籍充实其中,延请四方名儒教授太子与诸王。此后又兴建了东阁、华盖殿、弘文馆、秘书监等以度藏古今图书。为了管理宫廷图书,朱元璋还设置了独立的国家机构——秘书监。清朝统治者为了丰富官府藏书,曾三番五次下诏求书。顺治帝即位之初,就多次诏令天下,搜集有关明代天后、崇祯二朝史事的档册和典籍。康熙四年(1665),又因修《明史》,着礼部搜采明季史书,无论官吏还是百姓“如有征集所需图书,亦著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为了征集所需图书,在制造文字狱方面严酷无比的清统治者可谓至诚之极了。乾隆六年(1741)下旨征书“著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以广渠天禄之储”。为了编纂四库全书,乾隆帝亲自部署征书事宜,全国总计征得书籍 12337 种之多,为《四库全书》的编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民国初期,国民党政府曾一度非常重视藏书事业,确定教育部主管全国图书馆事业,颁布了图书馆法规。教育部于民国 4 年(1915)先后颁布了《通俗图书馆规程》和《图书馆规程》。《规程》规定图书馆应“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以供公众之阅览”。在《规程》的指导下,通俗图书馆及巡回文库有了长足发展。据《国民党教育工作报告》统计,1930 年全国有图书馆 1468 所,1931 年有 1620 所,1935 年达 2935 年。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成立以后,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始终十分重视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区、在陕甘宁边区、在解放区乃至在白区,党和人民政府对创

办图书馆事业做出过数以百计的决议、议案、决定、指示,为这一时期的藏书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党和人民政府的高级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徐特立、林伯渠等亲自为图书馆捐款捐书,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在延安就向 4 个图书馆捐款 990 元大洋,捐书数百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延安鲁迅图书馆的扩建捐款 300 元大洋;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延安图书馆改名时题写“中山图书馆”的馆名,他还和朱德总司令为子洲图书馆题写匾额;林伯渠、谢觉哉为延安鲁迅图书馆题写馆名。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人爱书、读书、用书、护书的一言一行,为号召社会各界人士关心和扶助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也给了图书馆馆员们为献身藏书事业以无限的鼓舞。当然,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政府的“禁书令”和“文字狱”等对藏书业具有毁灭性打击的政策和行为。这种政策和行为给世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教训和恐惧。

2. 经济环境对藏书业的影响

中国的藏书业,尤其是传统的藏书业,基本上是一种消耗性的公益事业,其社会效益重大而经济效益甚微。这就决定了中国藏书业对经济环境的严重依赖性。换句话说,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能给藏书业提供必要的经济的、物质的支撑,推动其正常运行;恶劣的经济环境,则无法顾及这种没有经济效益的公益事业,而可能是任其自然运行。如果藏书业长时期得不到经济的支持,它就会难以维持生计,甚至出现严重的生存危机。清代有些颇有影响的著名传世私家藏书,由于其家庭走向破落,其后代将其几代人苦心积累的宝贵典籍出卖以聊生计,导致百年私藏毁于一旦。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经济环境对藏书业的直接影响。

3. 文化环境对藏书业的影响

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及封建社会时期的文化教育活动相对有限,因而著书、刻(出版)书、读书、用

书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人类文化教育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刻(出版)书、读书、用书离不开藏书,同时又是推动藏书业发展的一种组合力量。藏书在著书、刻(出版)书、读书、用书的循环过程中起着一种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著书、刻书为藏书提供丰富的书源,藏书又为著书、刻(出版)书、读书、用书提供必要的文献信息。在这个循环过程中,文化教育环境与藏书业形成一种共进共退、共荣共衰的互动关系。

4. 宗教发展对藏书业的影响

中国的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绵延不绝。从中国最早建于汉代的洛阳白马寺到当今遍布全国的寺观,其生命力之强,其信教徒之众,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据元宣政院统计,至元二十八年(1291)时,全国有寺院24000余所,经过登记的僧尼凡21万余人,超过了当时各级学校的数目。难怪张养浩在上时政书会感慨急言:“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元代的这一历史记载,足以说明我国寺观兴旺发达的事实。寺观的产生和存在是以传教布道为其基本活动的,教义、经书则为其基本工具。因此,撰写、搜集、储藏、传播教义、经书也就成为寺观必不可少的重要活动。据《高僧传·僧佑传》载,早在南北朝时的建康定林寺,在僧佑主持期间,集合众力“造立经藏,搜校卷轴”,最多时藏经达4000余卷。据记载,唐代西明寺大藏编成的《大唐内典录》卷八《历代众经见入藏录》记录经律论传等326帙,共800部,3361卷,共用纸56173张。现存的敦煌遗书约五六万件,其中佛教文献占90%以上。内容大致有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祆教等宗教文书,经、史、子、集等儒家经典,还有文学作品、通俗读物,普通经书、年谱、家谱等等。历代寺观藏书不仅规模宏大,而且颇有惊人之处。如,宋辽时期,辽国所藏的石刻经书,可谓中国寺院藏书最大奇迹。位于今北京房山县的房山云居寺的石刻经,始刻于隋唐之际,历经千余年,累刻石经15000多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部石刻佛

教《大藏经》和唯一的一部篇幅最大的文字石头书,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据了极其辉煌的一页。又如宋代玉虚观道士徐道明,在德佑初年北兵围城时,他把观中所有书籍藏于石函中,又隐放在坎中,并危坐其上。当士兵以刀胁逼他离开时,他毫无惧色,岿然不动,最后为护道书而献身。此外,历史上的寺观刻经活动和手工抄经活动,也为藏经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之,宗教对藏书的影响主要就体现在藏经、刻经、抄经、传经、护经之中。

5. 科学技术进步对藏书的影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推动着藏书业的向前发展。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的发明,使知识的载体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纸的出现,无疑使得书的制作更为方便、经济、快捷,书的生产数量也越来越多,而且书的收集和保存更为方便,因而,也给藏书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和完善,实现了书籍的生产从手工抄写的方式向印制的方式转变,因而书的复本数量激增。这无疑给藏书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书源。同样,建筑科学技术的进步给藏书建筑带来的改善和进步,也证明科学技术的进步对藏书业产生着积极影响。

6. 战争和自然灾害对藏书业的影响

战争不仅给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的灾害和痛苦,同样给藏书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且不说兵荒马乱时人们无法也无心去从事藏书事业,就是那些兵匪的烧杀抢掠行径,也常常置已有的藏书业于死地。著名近代藏书理论家郑观应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自都中国库外,镇、杨、杭三阁早付劫灰,其家藏最富有,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所藏古籍,宏富异常,兵燹以来,半归散失。”清末著名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鲁西聊城杨氏海源阁毁于兵荒战火之中的惨状令世人难忘。民国十八年夏,国民党土匪王金发攻陷聊城,司令部即设在杨氏院内,海源阁藏书遭受空前

浩劫。除匪首大肆携掠与兵匪携出盗卖外，随手毁坏之状更是目不忍睹。‘炊火以书代薪，夜眠以书作枕，至拭桌、拭烟枪，无不以书代之’。匪动过后，‘杨宅已不见一人，院内室外，书籍满地，厕所马厩，亦无地无之，院内书籍为大雨淋烂’。杨氏见大势已去，遂将劫后残留捡装 50 余箱运往济南，从此不复回乡。次年，王冠军再陷聊城，又一次对海源阁进行洗劫，使海源阁至空无一物，历经百年的文化宝地遂成一座废墟。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对中国的藏书业也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掠夺。整个抗战期间，全国图书馆由 1848 所减少到 831 所，各类图书馆所损失的图书在 1500 万册以上^①。自然灾害，主要是火灾、虫灾和水灾，对中国藏书业造成的损失也是十分惊人的。例如，坐落在北京西什库教堂的北堂图书馆，在嘉庆十二年 1807 发生的第二次禁教，东堂火灾，损失惨重，全部东堂藏书仅 13 册得以幸免。再如，著名的上海商务印书局的东方图书馆，1932 年 2 月 1 日遭日本浪人纵火，40 多万册藏书除宋元精本 574 种 5000 多册，因感予当时局势紧张早已移藏金城银行保险库而得幸免外，其余尽成灰烬。历史上有关藏书遭受战争和自然灾害者，真是不胜枚举，教训惨痛。

7. 藏书家对藏书业的影响

中国历代藏书家是推动藏书事业不断发展的一股强大力量。首先，他们爱书如命，将藏书作为人生的第一乐趣。历史上不少藏书家为了藏书，拿自己的俸禄、家庭资产去购书，乃至不惜节衣缩食、典当私物。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竭其俸入，以事铅槧”；“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的爱书藏书行为成为千古佳话。其次，藏书家以抄书、刻书的实际行动来丰富私家藏书。如，清代冯舒、冯班及何

^①韩后桐：《中国对日战争损失之估计》（1932—1943），第 56—57 页，中华书局 1946 年版。

大成闻得寒山赵氏有宋刊《玉台新咏》，于冬月“朔风飞雪中，挟纸笔，袖炊饼数枚入山，匡造其庐，乃许出书供录，堕指可冻，穷四昼夜之力抄副本以归”。类似众多的求书若渴，不辞辛劳抄书的行为令后人赞不绝口。再次，著书家兼藏书家们亲自著书立说，以丰富藏书。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朝代，亦无论是经学家、史学家，凡有著述传世者，无不有数量可观的书籍之藏。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惠施，两汉的刘德、刘安、蔡邕，魏晋时代的王粲、王弼、张华，南北朝的陆澄、沈约、李谧、沈麟，唐代的许善心、魏徵、颜师古等等，既是著名的著家，又是著名的藏家。有人做过专门统计，中国历史上较有成就的藏书家中，属学者型的即著家兼藏家的占 33.8%。第四，历史上还有一种集刻书、售书和藏书于一身的藏书家。明代的大出版家毛晋，从明末到清初刻书数百种，世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称。他藏书积至 8.4 万册之多。这种集刻、售、藏于一身的藏书家，对中国藏书业具有特殊的贡献。第五，藏书家的典籍的捐公。进入近现代，众多的私人藏书家从爱国为公、服务民众的意识出发，纷纷以私藏捐奉给各地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为中国近现代的藏书业发展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三、中国藏书的一般特征

1. 地域性特征

首先，中国是一个地广物博的多民族国家，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任何一个历史朝代的京都，因为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和统治者施政的需求，那里的藏书也比其他地方要集中得多、发达得多。其次，一个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那里的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他们就有余力去举办藏书业，那个地域的藏书业也自然较为发达。其三，一个地域的人文教育较为发达，那里的学校办得多，读书人多，著书立说的人也多，那里的藏书也随之较多。再说，如果一个地域的宗旨

文化比较发达,那里建的寺观庙宇多,僧侣们为诵经、传经、护经就一定会多写经、多藏经。因而,那里的藏书也就多了一个来源。

2. 阶段性特征

中国的藏书的形成过程经历过萌芽、成熟、完善和发展几个主要阶段。中国每一个朝代的藏书大致又经历过恢复、创新、发展、鼎盛、衰落的过程。每个发展阶段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学校图书馆等等)。第三,从藏书规模来看,有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甚至还有微型的。第四,从藏书举办者来分,有官吏、商人、僧侣、道士、学者、军人、地主,还有学生,几乎涉及到各种职业群体。藏书的多样性特征充分展示出中国藏书业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

第二章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藏书

我国古代藏书事业，是随着文字的产生和成熟、文化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逐渐发展起来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第一个王朝，出现了官府藏书。商代经济显著发展，文化事业进一步繁荣，官府藏书系统有了进一步发展。周代尚文重史，藏书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不仅藏书规模扩大，藏书处所增加，管理制度更加明确，管理方法更为精细，出现了早期的分类，藏书的利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从春秋到战国，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大发展、学术大繁荣的时期，我国古代藏书事业产生质的变化，诞生了私家藏书。秦代藏书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空前惨烈的灾祸，也是中国藏书史上的一大损失。它不仅阻碍了藏书事业的发展，而且影响此后历代藏书的质量。西汉统治者汲取了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采取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藏书事业，使之走上了持续发展的轨道。东汉统治者也同样重视藏书建设，藏书数量惊人，品种愈加庞杂，其藏书规模超过了西汉。另外，最终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独立的佛教寺院藏书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由汉代文明走向唐代文明的过渡

阶段，也是我国藏书事业走向新的发展高峰的过渡阶段，其藏书事业虽历经劫难，却仍缓慢发展，并最终形成了另一个道教宫观藏书体系。

第一节 先秦时期藏书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文明的历史。有了文字，才会出现图书文献，也才会有藏书活动。因此，研究藏书的历史，首先要从文字的产生和图书的起源说起。

一、文字、图书的起源

1. 汉字的起源和使用

文字的产生并付诸使用，是图书产生的先决条件。学术界有的人曾把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字作为中国文字的起源，作为中华民族进入文明历史的标志，以至于讲中国古代史，只是从距今 3500 余年的殷商王朝说起。这是对中国文字的起源与使用历史及对中国文明历史的不公正回答。

中华民族迈进文字历史门槛的时间很早。在远古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是利用结绳、书契、图画作为文字来记事。结绳、书契、图画本身不是文字，但它们是文字的先驱。它们最初的作用和文字相同。我国的汉字源远流长，很早就有关于汉字发明和使用的记载。《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注：“后世圣人，谓黄帝尧舜也。”这两段话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文字发明之前，有一个结绳记事阶段，从结绳记事到文字发明，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二是文字发明出于统治的需要，即所谓“百官

以治”。

现有资料说明,《易·系辞》所载的这个传说是有根据的。先是结绳记事,后来才有文字,这是世界许多民族共同的经历。说文字发明于黄帝尧舜时,也大体符合历史实际。关于文字起源于黄帝时的传说,由来已久。《世本·作篇》“黄帝使仓颉作书。”后来《荀子·解蔽》《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君守》,以至汉代的《淮南子·本经训》《说文序》都有仓颉造字的记载。考古资料说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上有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合,被认为是中国文字的起源,迄今已有 6000 年左右。从汉字的起源到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集体创造过程。仓颉所做的应是继承和整理,起了整齐划一的作用,可以说是促进文字定型的关键人物。章太炎《造字缘起说》“《荀子·解蔽》篇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依此,是仓颉以前已有造字者。”夏朝建立以后,出于统治的需要,在设官分职时,有专人研究并使用文字,促进了汉字的成熟。到夏商之际,汉字已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

《尚书》有《夏典》,夏朝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说明人们已能运用汉字记录政事活动。这些历史资料,单靠口传是不能那样完整地流传下来的。现存最古的文字是 3500 年前即商代后期的殷墟甲骨刻辞。从 1899 年清国子祭酒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后,经过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在安阳地区的大规模发掘,至今已先后获得甲骨十余万片。文字多少不等,少的三五字,多则几十字。经研究,这些甲骨文是盘庚迁殷(公元前 14 世纪)至殷亡(公元前 12 世纪)前后 270 多年的文字记录。1977 年又在陕西周原地区发掘一批西周早期的甲骨共 17000 多片,其中刻有文字的近 200 片,一片多的有 30 字,共 600 多字。字形很小,刻画整齐,说明雕刻技巧已相当熟练。从形体看,尽管字形与现代汉字很不相同,但甲骨文已具备多种形式;从文字结构看,有形声字、通假字、数字字和用作人名和族名的符识字,说明甲骨文已进入成熟阶段。从内容看,大量的的是占卜刻辞。除卜辞外,甲骨

文中还有一些记事刻辞，与卜辞无关。记事刻辞多刻在兽骨上，是当时史官的政事记录，流传下来，就是历史文献。

甲骨文在先秦人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先秦人把它作为典籍收藏之列。从严格意义来说，它还不是书籍；从广义来说，甲骨文属于书籍范畴，是书籍的雏形，是书籍的最原始形态。

2. 图书的起源

关于我国最早的图书产生，有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即“河图洛书”。传说伏羲统治天下时，龙马背负“河图”出现于黄河，神龟背负“洛书”出现于洛水，伏羲据以画成八卦，后来演成《周易》。传说并不是历史，但它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

《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尚书》中也有同样的说法。这是最早把图书二字连在一起，是“图书”一词的出处。书在先秦，除称为“书”外，还称为“典籍”“文献”“图书”。从古代文献和考古来看，图书确实产生很早，在距今 4500 年左右的五帝时期便有文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据汉孔安国《尚书序》说：“三坟”是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五典”是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按照孔安国的说法，先秦传说中的这些古书都指三皇五帝时期的书。《周礼注疏·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类著作有《黄帝君臣》10 篇。1973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十大经》14 篇，其中有 9 篇记载黄帝君臣言行、内容、题名与《汉书·艺文志》相符，可能是同书异称。《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为五帝之首，司马迁在篇末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

德》《帝系姓》章矣，顾第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窥见司马迁是花了很大工夫广为搜集、精心选择五帝资料的。另外，《尹文子》载：“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这说明五帝时期已有治世文书。

总之，五帝时期我国文字已广泛使用，产生了文献。可以说，当时史官记言记事的资料是书籍的起源，史书是最早产生的书籍。

二、夏、商、周王室藏书

1. 夏王室藏书

夏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第一个王朝。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形成了制铜、造车、酿酒、制骨、纺织、陶器等部门，而且还能制造一些比较精美的玉器。在文化艺术方面，夏代的音乐、舞蹈和宗教，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夏代文字更趋完善，史官制度也已经确立，这些都为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萌芽奠定一定的基础。这一时期，较多文献的出现、夏王室保存文献观念的形成和多种多样的文献载体等，都表明我国的官府藏书早在夏代便已经出现了，其理由有以下诸方面。

首先，夏王室拥有文献。根据古籍记载，夏王室留存后世的文献，可知的大致有五帝时期产生的一些文献，如《虞书》《三坟》《五典》《河图》《洛书》《连山》《归藏》《苍颉书》以及一些铭文等，都流传到了夏王室，并由夏王室保存起来。此外，夏王室有《书》，即《尚书》中的《夏书》。《春秋左传》和《国语》屡屡提及《夏书》并引其文。战国诸子也常引《夏书》。《夏书》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流行于官府、诸子之中，也为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所喜爱。春秋战国时流行的《夏书》，有的已遗失，有的流传到了后

世。夏代典籍还有《夏时》和《夏小正》。关于《夏时》，《竹书纪年》载，帝禹元年“颁《夏时》于邦国”^①，《史记·夏本纪》也称“孔子正夏时”。《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鲁国的天文学家梓慎称赞《夏时》说：“夏数得天。”就是说，夏历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天象运行规律。《夏小正》是夏王朝留存后世的农书，战国时曾广为流传，故司马迁说：“学者多传《夏小正》。”^②它包含夏代在农牧业生产中积累起来的一些天象和物候知识，是后世窥探夏代农业的重要文献。在先秦及后世典籍中，还保留着不少夏代有名称的文献，如《孟子·梁惠王》下记有《夏谚》，箕子称《洪范》始于夏禹，《史记·夏本纪》记禹时作乐《箫韶》，等等。

其次，夏王室已形成了保存文献的观念。夏代设有左史、右史，记言书事。夏王室的文献由史官保管，是经过有序整理后收藏的。《吕氏春秋·先识》记：“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出奔如商。”《墨子·非命下》也载：“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由此可知，夏代也和商、周一样的，典籍是有序整理收藏的，即“从十简之篇”，以十篇编为一卷的。

最后，夏王室具备了收藏图书的专门处所，即宗庙。据《竹书纪年》记载，在夏都里，除建有宫室外，还有宗庙。《墨子·明鬼下》载：“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载：“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注》：“世室者，宗庙也。”据此可知夏王朝有宗庙，而且可知其宗庙的建筑结构及规模。

2. 商王室藏书

商代是我国奴隶制度日趋发展的时期。与夏王朝相比，商

① 方诗铭等：《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司马迁：《史记·夏本纪》，四库全书影印本。